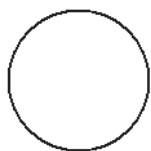


#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9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九期 ★

## 目 录

###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

- 西藏人民的新生 ..... 章 鲁(1)
-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 柯庆施(8)
- 大型厂矿的“综合经营” ..... 牛中黄(18)
- 科学与生产 ..... 刘仙洲(22)
-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 胡 绳(30)
- 农业中学大有可为 ..... 陈 光(35)
-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比喻 ..... 唐启运(41)
- “醒来吧，美国！” ..... 杨重光(46)



#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 西藏人民的重生

章 魯

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策动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他们所控制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他们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

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和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是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维护祖国统一的。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则蓄意撕毁协议、分裂祖国统一。在维护祖国统一和破坏祖国统一这两种力量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西藏叛乱事件的平定，表明维护祖国统一的力量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所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协议。协议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八年来坚决执行协议，在团结西藏人民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英帝国主义在一九〇四年攫取了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的通商特权，英帝国主义后来是印度政府在以上三地派驻官员、军队，开办邮政电报、学校、医院，沿途设立驿站，并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这些特权，在一九五四年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与印度共和国政府的外交谈判，全部取消了。英帝国主义挑唆尼泊尔王国进犯西藏所取得的各种特权，经过中尼两国政府的外交谈判，也在一九五六年取消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摆脱了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尽管受到上层反动集团的多方阻挠，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由于国家的帮助和兄弟民族的支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西藏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以及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人民建设新的生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仍然没有放弃侵略西



藏、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一贯勾结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死不甘心。他们狼狽为奸，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就蓄意进行破坏，企图把西藏地方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八年以来，以鲁康娃·泽旺饶登、索康·旺清格勒、赤江·罗桑益西、帕拉·土登为登、柳霞·土登塔巴、仔本夏格巴、嘉乐顿珠、宁妥·札西顿珠和威萨坚赞（功德林札萨）等为首的叛国集团，在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下，进行了一连串的反国阴谋活动。一九五一年冬天，当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西藏的时候，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代理藏王）、叛国首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领导下，一部分反动分子在拉萨组织所谓“人民会议”，公然反对协议，叫嚣要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后来因为受到中央的严正指责，原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宣布反动的“人民会议”为非法，并撤销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司曹职务。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分裂祖国的反动活动没有因此停止。一九五六年底，他们又利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的机会，企图劫持达赖喇嘛，不让他返回西藏，同时阴谋在拉萨发动叛乱。

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中央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些反叛分子，中央并没有直接出面处理，而只是责成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制止和惩处，并且再三申明，只要他们改过自新，仍可不予既往。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对于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竟然无动于衷。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西藏各地疯狂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的群众，扩大叛乱队伍，到处截击汽车，破坏公路，杀戮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终于在三月十日在拉萨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并且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长期以来，聚集在印度噶伦堡，勾结帝国主义特务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进行罪恶活动的西藏叛乱分子，在这时候，也更加疯狂地活动起来，把噶伦堡作为指挥叛乱的中心。与此同时，印度的一切扩张主义分子大肆进行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叫嚣什么“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中国政府平定叛乱是“侵略行动”。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这种一唱一和、里应外合，暴露了这次的叛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策动的。他们所策动的这次叛乱，同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及其他民族国家所策动的破坏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是什么母子关系，那么，西藏的一小撮认贼作父的叛国分子的确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亲骨肉，而且他们都是从小英帝国主义一脉相传下来的。在西藏叛乱平息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如丧考妣，两行眼泪流个不停，这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

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说什么“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说什么“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的”，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信口胡说。从十三世纪以来，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甚至达赖喇嘛



的封号、地位、职权，都是由历代的北京朝廷陆续规定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一九四〇年“坐床”，也是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派人到拉萨去主持的。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是由英帝国主义者和他在西藏的走狗叫嚣出来的。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绕嘉措、阿旺嘉措等代表，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这种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谬论。

英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西藏已将近一个世纪。一八八六至一八八八年英军第一次向西藏边境侵略，占去了哲孟雄地方（锡金）。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又向西藏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攻陷了拉萨，从腐败的清朝政府取得了在西藏的各项特权。西藏人民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抵抗，使英帝国主义者感到单靠军事侵略不能达到奴役西藏人民的目的，在一九〇四年以后，英帝国主义者对西藏的侵略就转而采取了更为阴险、更为恶毒的办法。他们标榜“帮助”西藏民族“独立”，以迷惑西藏人民，转移西藏人民的斗争目标，企图使他们由反对帝国主义转而反对祖国。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英帝国主义就在西藏大农奴主当中物色了一批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把他们扶植起来，攫取西藏统治地位，执行英帝国主义者交给他们的任务。这样，早在二十世纪初叶，英帝国主义者就在西藏内部培植了一批代理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积极插手侵略西藏。一九四七年以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干涉和分裂政策。从此，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多年培植起来的一批走狗，就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重重奴才。这一批奴才，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西藏大农奴主的利益。他们所以死心塌地甘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走狗，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同残酷剥削西藏人民的反革命阶级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让我们看一看这次组织西藏叛乱的一些首恶分子的来历，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索康·旺清格勒，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他家几代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从小就在英帝国主义者在江孜所办的英文学校读书，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一九四一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经派他向英帝国主义购买军火。一九四七年，他和另一个噶伦拉鲁屠杀了西藏的爱国分子热振呼图克图。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前逃亡印度，一九五二年又回到西藏，执行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交给他的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动任务。索康·旺清格勒的父亲，就是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来的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前任过“外交局”长，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有密切的联系。索康·旺清格勒的弟弟索康·拉旺多杰，在印度大吉岭英文学校和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一九四七年以“西藏商务代表团”团员身分去过美国和英国，西藏解放后一直住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



赤江·罗桑益西，一般称“赤江活佛”，他出身于西藏大贵族凯墨家中，同时又是一个大买办，在西藏买办商业机构喜馬公司中有大量股金。他是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前藏王大札的亲信。西藏和平解放前，曾經到印度“游历”，勾結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西藏和平解放后，一貫在幕后策划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是西藏叛国集团的重要“謀士”之一。一九五五年他随达賴喇嘛从北京回西藏路过四川藏族地区的时候，到处点火，煽动所謂康巴人进行叛乱。

帕拉·土登为登（僧官），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卓尼（达賴喇嘛的副官长）。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前藏王大札的亲信爪牙。解放以前，他在自己的家乡江孜与印度駐軍有密切联系。他是一九五二年伪“人民會議”反革命組織的策謀人之一。他弟弟帕拉·多吉才旦也在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訓練，曾經担任古松代本（达賴喇嘛警卫团团长），是这次叛乱的骨干。

宇妥·札西頓珠，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理噶倫。他曾在印度受过英帝国主义的軍事訓練。一九四八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帝国主义訂購軍火。一九五〇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經任命他为赴英“亲善使团”团长。西藏解放后，他往来于印度噶倫堡和拉薩之間进行叛国活动。

魯康娃·澤旺饒登，是西藏和平解放前的代理藏王，是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忠实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后，他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命令，組織伪“人民會議”，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撤职后，逃亡印度的噶倫堡，成为流亡在噶倫堡的西藏叛国分子的头目。这次西藏武装叛乱发生后，他曾率領所謂“西藏代表团”向印度政府請願，他們在給尼赫魯总理的“呼吁書”中奴顏婢膝地說“跪在你的面前”祈求帮助。

仔本夏格巴，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全藏財政、人事、俗官訓練等事务的重要官員。他曾留学英国，是經過英帝国主义者长期培养的一名忠实走狗。一九四八年，西藏地方政府派他担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国和英国活动，要求美国的“援助”。一九五〇年，他又被任为“西藏亲善使团”团长，准备再去美、英活动，要求英、美、印度、尼泊尔出面干涉，阻止人民解放軍进駐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他一直住在噶倫堡与嘉乐頓珠、阿乐群則等反动分子結合在一起，进行叛国活动。

这一群由英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走狗，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西藏的政治上的代理人，同时又是外国侵略者在經濟上掠夺西藏的大买办。他們壟断西藏地方和国外的貿易，英帝国主义以及它的繼承者通过他們榨取西藏工业原料（如羊毛、硼砂、皮张、鹿茸、麝香、药材等），傾銷剩余生产品（布匹、毛織品、烟草、糖、五金等等），致使西藏市場在解放前完全由外貨占領。

这一批外国侵略者的忠实走狗，都出身于西藏的大农奴主家庭。他們每家占有的农奴，多的一万人以上，最少也有一千多人。他們每家从农奴身上压榨来的地租，多的



一年达到三万多克(一克约合二十五市斤),最少的也有两三千克。他们为了永世保存西藏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需要帝国主义作他们的“靠山”;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为了奴役西藏人民,为了阻止西藏人民的觉醒,也就尽力维护西藏的农奴制度,尽力维护这批美国贼对西藏人民的残酷统治。

西藏的农奴制度,比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还更野蛮、更黑暗、更反动。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下,西藏的全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由贵族、寺院和地方政府所占有。西藏贵族总共二、三百家,大农奴主有二十多家,而最大的只有七、八家。政府占有的土地可以分封给贵族和寺院,贵族和寺院占有的土地可以互相赠送、布施、抵押,但不能买卖。西藏的农奴主就是依靠这些土地的占有对西藏的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拿出很少的土地,作为给农奴的份地,使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每年要以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进行无偿劳役。农奴主只拿出种子,至于耕牛、农具、劳动力等等都由农奴负担,从春耕、夏耘一直到秋收、冬藏,完全由农奴承担。农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的时候还要自带伙食。农奴的劳动,一般都是在贵族的管家监督和鞭打下进行的。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如果逃亡被抓回来,就要受很重的处罚,甚至被挖眼、割鼻或砍去手脚。农奴生下子女,贵族立即登记在帐簿上,当做财产看待。贵族为了镇压农奴反抗,在很多的庄园内都设有监狱和刑具。贵族可以将农奴连同庄园一起赠送、抵押或者布施给别人,还可以把农奴作为陪嫁的财产。

所有农奴还要担负贵族、寺院和西藏地方政府各种沉重的差役。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来往,都要由沿途农奴无偿供给乘马和住宿,要送牛羊肉、酥油、豌豆、糌粑等礼品,并且要派年轻女子侍候。地方政府的军粮调拨、物资运输,都要由农奴派出牛马和人力无偿转运。地方政府的房屋,也由农奴无偿建设和修补。贵族和寺院的农奴除了担任地方政府的差役之外,还要担负贵族和寺院的各种差役,如修理房屋、运送粮和货物,以及背水、砍柴、扫地、饲养马匹等等家务劳动。因此,农奴剩下来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的时间就非常少了,他们的份地很多都荒蕪了。

农奴为了生存下去,常常只好靠借债过活。据在拉萨以北的朗塘、卡则、林周、旁多等四个宗(相当于县)的调查,旁多有一百六十六户,全部负债;林周二百二十七户,有二百一十七户负债;卡则二百一十五户,有一百八十五户负债;朗塘五十户,有四十户负债。负债户一般占户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些负债户中负债一万克粮食以上的十二户,五千克以上的十四户,一千克以上的一百五十九户,五百克以上的一百零六户,一百克以上的二百六十六户。这些农奴的债务,都是上辈遗留下来的,据说有的已经有一百二十年,有的已经有三辈的历史。

原西藏地方政府就是农奴主专政的工具。农奴不但根本不能参与政治,而且不能与贵族平起平坐,不能与贵族通婚,甚至服装样式、说话用的许多词汇,也是不能和贵族



相同的。在宗教界，出身于农奴和牧民的广大贫苦喇嘛也不能参与政治，也受着宗教上层的压迫和剥削。

对于这样一种野蛮、反动、黑暗的农奴制度，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类都认为应该改革，只有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集团才想要把它千年万代地保留下去，让西藏劳动人民子子孙孙永远过牛马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一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梦想。

实行社会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律。但由于各个民族具体条件不同，社会改革的时间、步骤和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早在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对于西藏地方应该进行社会改革，就已经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根据西藏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为了使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中央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慢一些进行，并且可以由人民和上层人士经过民主协商去和平地解决。一九五六年，中央又根据当时的西藏情况，宣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西藏可以不进行社会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决定。对于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宗教信仰的基本政策，更是作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一贯地坚决地执行协议和中央的上述规定。西藏的农奴制度原封未动，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依旧受到尊重，不论什么教派的喇嘛寺院一律受到保护，他们的收入没有作任何变更，他们的宗教活动依旧进行。所有这些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但是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想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胡说什么这次叛乱是由于中央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无非是要掩盖叛乱分子背叛祖国、出卖西藏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掩盖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侵略西藏、干涉我国内政的可耻阴谋。

与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叛国集团的愿望相反，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叛乱的平息，促进了祖国的统一，促进了西藏人民的新生。他们企图用武装叛乱来堵塞在西藏实现社会改革的道路，堵塞在西藏实现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的道路，但是结果却激起了西藏广大人民的义愤，使西藏劳动人民被压抑已久的对于实行民主改革的愿望，迅速地昂扬起来；在中上层人士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而叛乱的平息，原西藏地方反动政府的被解散，也为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扫清了道路，这就将导致西藏民主改革的提前实现，使西藏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民主的地方自治。西藏今后的民主改革将按照西藏人民的意志，照顾西藏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办法，逐步进行。在改革中和改革后，一切爱护祖国统一的贵族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包括







新生(国画)

黄强作

赞成改革的进步人士和经过说服可以同意改革的中间人士，都将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受到妥善的安排。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农奴制度的束缚，才使它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使绝大多数西藏人民陷于极端黑暗的地狱般的生活。现在，西藏大农奴主横行不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藏人民摆脱农奴制度的新生时代已经到来了。毫无疑问，粉碎了这些套在西藏人民身上的重重枷锁以后，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在西藏高原上建设起人间的天堂，西藏民族一定会同国内各兄弟民族一样，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和生活幸福的先进民族。一个光辉灿烂、无限美好的前途，已经展现在西藏民族的面前。一切爱国的进步的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美好的前途前进！



#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柯庆施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的国家将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建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常常盘算这个问题：从现在开始，在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斗争中，上海的奋斗目标应该是：鼓足最大的干劲，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最快的速度，生产数量更多和质量更好的产品，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输送更多的技术力量，来支援全国各地。当然，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国家今年交给上海的任务，保证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胜利实现。

一九五八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为一百七十一亿三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三（不包括郊区十一个县的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五点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四百五十三点五。这一年增加的产值为五十七亿三千万元，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工业产值增加的数字。根据国家今年分配给上海的各项任务，今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计划为二百四十八亿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完成国家计划是上海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上海人民应尽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保证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而且要争取超额完成。用什么方法完成呢？我们确定在全面开展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和基本上做到不增加工人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这就要使今年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说，要使上海今年一个工人生产的产值，相当于去年的一个半工人生产的产值。我们认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是今年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实现大跃进的主要途径，而且是今后高速度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只有这样，在完成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上海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发展 上海工业的主要途径

为什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主要途



径呢？能不能办到呢？

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对于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主要采取增加工人，还是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一部分同志偏重于增加工人；但是大多数同志觉得，就上海实际情况来看，应该以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主。

增加工人是发展工业生产的途径之一。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国经济落后的标志。所以，我们的国家今后必须继续兴办许多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继续扩充和壮大工人阶级队伍。这在全国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来说，由于它地处沿海，距离原料、燃料产地和内地市场过远，为着工业布局合理和改变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上海新建、扩建项目不宜过多，增加工人也很有限。因此，增加工人不应当

成为今后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主要途径。

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发展工业生产的途径。对发展全国工业生产来说是如此，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尤其必须采取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途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由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和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对比来计算的。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但却节省更多数量的劳动时间；或者是消耗同样数量的劳动时间，但却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这都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厂增加一个工人，只能增加一双手，或者是八个劳动小时。如果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节省，虽然这个工厂没有增加一个工人，但也无异于增加了一只手、一双手、更多双手，或者是四个劳动小时、八个劳动小时、更多个劳动小时。这样，纵使减少了一部分工人，总产值也不会减少，或者还可以增加。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例一：下面所举的国营第二印染厂，一九五八年的职工人数，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四，但是产值和净产值反而都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国 营 第 二 印 染 厂		职工人数	产 值 (元) (每一职工平均)	净 产 值 (元) (每一职工平均)
	一 九 五 七 年	1,142	52,330	8,825
	一 九 五 八 年	1,100 (注)	70,245	12,065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七年增减的百分比	-3.68%	+34.24%	+36.71%

(注) 一九五八年还抽调出部分人员用以建立化工车间和汽车修理车间



例二：下面是去年十二月上海钢铁一厂和三厂的三个炼钢车间的比较。上钢三厂老转炉车间的劳动生产率最高，这个车间平均每一职工的钢产量几乎比上钢一厂新转炉车间多一倍。

车间	设备(座)	车间本月总产量(吨)	车间本月职工总人数	劳动生产率(实物)	
				每人每月(吨)	每人工数
上钢一厂新转炉	碱性8吨6座	20,685	2,181	9.46	3.27
上钢三厂老转炉	碱性6吨4座	27,172	1,488	18.26	1.70
上钢三厂新转炉	碱性8吨6座	29,403	2,046	14.37	2.16

根据上海冶金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统计资料

例三：去年上海某些主要行业，由于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节省，每一个工人平均产量提高很多。如下表：

		电力(万度)	汽车轮胎(条)	金笔(支)	卷烟(箱)	纸张(吨)	棉纱(件)
每年平均工产量	一九五七年	59.1	197	2,985	89	19	17
	一九五八年	79	306	5,773	94	21.6	21.8
	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增长的百分比	33.67%	55.33%	93.4%	5.62%	13.68%	28.24%

从前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劳动生产率愈高，意味着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工业产品量愈多，也就是说，用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用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愈多；同时，也意味着活劳动、物化劳动（原料、燃料、机器折旧费用）愈加节省，单位产品的成本愈加降低，也就是说，用以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有可能愈来愈多，生活资料的价格也有可能随之相应降低。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源泉。进一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

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是降低劳动强度、逐步缩短劳动时间、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曾说：“社会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它就赢得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其他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无论对于个人或社会，其发展、消费和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4卷，第119页）所以，列宁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90页）



## 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有利条件

今年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五是不是可能呢？我們的答复是完全肯定的。我們的根据是：

一、九年来，由于上海工人階級的努力，工业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們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国内許多先进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比我們高。这就告訴我們，在这方面还有潜力可以挖掘。这一情况提醒我們不能滿足于已有的成就，并且鞭策我們要迎头赶上去。

二、上海拥有近百万的产业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具有丰富的劳动經驗和熟練的生产技能的老工人。上海还拥有一支很大的技术人員队伍。这些技术人員經過整風和大跃进的实践，政治觉悟和革新精神都有所提高。去年一年中，在領導人員、技术人員和工人互相結合之下，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有了很大的开展和成就。这就为今年上海工业大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創造了有利条件。

三、上海是个老的工业城市，但是許多企业的設备比較落后，机械化的程度也不高。根据初步統計，在全市工厂企业的九十万工人中，从事机械化操作的仅占百分之二十七，半机械化操作的占百分之三十六，手工操作的还占百分之三十七。各个行业的情况是这样：在冶金系統机械化操作

占百分之十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二十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六十；机械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三十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六十；化工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七十，手工操作占百分之二十五；电机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二十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十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六十；紡織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四十，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十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四十五；輕工业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十，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五十，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四十。

設备好坏，机械化操作、半机械化操作或手工操作，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很大的。以下是一部分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一九五八年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較：

生产机床的明精机器厂为一万零七百六十八元，普陀机床厂为七千零三十一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三。

生产电纜的大来电纜厂为七万二千四百五十元，丽华电纜厂为五万零八百六十三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二。

同兴袜厂电动織袜为八千三百七十九元，培德袜厂手搖織袜为二千三百九十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二百五十。



萃众織造厂电織毛巾为一万零九百六十五元，統一毛巾厂手拉脚踏生产为四千七百十四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二百三十。

从以上的材料来看，虽然形成劳动生产率高低差别的因素不止一个，但是机械化程度的高低有重要的影响。目前上海全市工业中手工操作平均占百分之三十七，有些部門还占到百分之六十。如果把机械化程度提高一点，劳动生产率是可以相应地提高的。

四、上海工业各行业比較齐全，便于进行生产协作和經驗交流。生产协作不仅可以做到充分发挥生产潜力，而且可以創造新的生产能力。

五、現在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一九五八年各工业部門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号召下，都創造了不少先进經驗，生产效率有显著提高，但是，同等条件的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間还有較大的距离。例如：

鋼鐵工业中平爐利用系数（即每平方公尺爐底面积昼夜平均产鋼量）：

最高企业	13.665吨
最低企业	9.982吨

机械工业中鉄鑄件成品率（即合格成品量占投料量的比重）：

最高企业	97.43%
最低企业	37%

鋼鑄件成品率：

最高企业	67.05%
最低企业	48.50%

造纸工业设备利用率：

最高企业	91.44%
最低企业	64.51%

卷烟工业中卷烟机设备利用率：

最高企业	52.50%
最低企业	35.68%

紡織工业中每千紡錠每小时产紗量：

最高企业	31.72公斤
最低企业	26.11公斤

我們應該認真地总结去年各部門中創造了先进指标的企业的經驗，并且組織其他企业来学习和推广这些經驗。只要每个工业部門中落后的企业努力赶上或者接近先进企业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以上的一些分析来看，我們的条件是很有利的。但是，要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轉化为现实，还需要坚决地依靠群众，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資产阶级主要是采用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和加重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的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关心的，因为不論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帶給工人群众的总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条件的恶化和工人的更加貧困化。与其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們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都是从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出发的。而提高



劳动生产率、迅速发展生产的目地，又是为了建設无比幸福美滿的新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工人群众在党

的领导下認識到自己劳动的崇高意义，所以自觉地积极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

## 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措施

为着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們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搞技术革命。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

技术革命，包括技术革新在內，从低級的一直到高級的，都是我們迫切需要的。去年全市技术革新的建議一共有四十七万条，已經实行的有二十多万条，有一万五千条比較重要。从实践中我們可以看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这几个方面：工艺方面，包括工具、操作方法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设备方面的革新和革命；产品设计方面的革新和革命；原料、材料方面的节约，代用和新的原料的制造。从以上这四个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就可以减少工时，减少物化劳动的消耗，同时也可以降低劳动强度。去年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同一九五七年比較，按职工計算，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八，按生产工人計算，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六。这个成績的取得，主要是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結果。而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不論是創造革新，或者是总结推广，都还大有可为。只要我們繼續發揮职工群众的冲天干劲，把敢想敢说敢作的精神和尊重科学的实事

求是作风結合起来，繼續貫徹执行领导人員、技术人員和工人互相結合的方針，我們今年就一定能够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不断提高机械化的程度。前面分析过，上海工业机械化的程度是不高的。怎样提高呢？主要靠自力更生。去年我們貫徹执行了洋土結合方針，全年自制的土机床和簡易机床四千八百零八台。例如，前进机模厂工人二十天內自行設計制造了十多部大部分用木料做的土机器，用机械操作代替了鋸、刨、切、磨、車、銑、凿等几道主要工序的手工操作，全行业普遍推广两个月后，超額百分之三十三完成任务。机械工业部門則采取“蟹吃牛”的办法（也就是“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加工大型设备，克服大型机械不足的困难。今年同去年一样，必須进一步貫徹洋土并举的方針。与此同时，上海絕大多数厂也应该有计划地进行设备更新，采用新的技术，新的设备。

第三，改进生产組織和劳动組織，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过去几年，企业中非生产人員太多，去年下放了许多，調动了不少，但是，管理人員所占的比例还是大了一些。非生产人員一多，既浪費了宝贵的



人力，又增加了管理费用，增加了生产成本。在生产工人当中，由于劳动组织得不合理，有些工人忙得很，有些工人则往往“打一天鱼，晒两天网”，闲在那里，没有事情做，劳动力浪费很大。劳动组织不得当，也牵涉到生产组织不能因地制宜，合理调整，上下工序之间不协调，我等你、你等我，或者是你来我往，甚至奔波终日，尚未解决问题。因此，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及时相应地把劳动组织，生产组织加以调整，以便每一个人充分地发挥他的作用。

第四，认真地、持久地、深入地开展为技术革命服务的文化革命；进一步贯彻执行领导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互相结合的方针；提高工人、艺徒的技术熟练程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工厂的业余学校一定要办好。凡是办得好的工厂业余学校，大都由于在师资上、教材上、教授方法上贯彻了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书本知识和生产经验相结合、课堂讲授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老工人，有丰富

的生产经验，有英勇的创造精神，如果再提高文化的基础上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就必然会在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会出现不少优秀的科学家。我们不但应当加强科学研究机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每个工厂企业也应该开展科学研究。

第五，在加强对工人群众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根据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适当地重视物质奖励，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重大的意义。

从以上几个方面去努力，肯定地说，一定会有良好的结果。不过，为着保证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高，我们还要注意很好地安排生产。安排生产是一种艺术。掌握得不好，就不能按时、按量、按质地完成生产任务，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削弱或者抵销了上述各项措施的成就，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得不多甚至降低。掌握得好，则可促使劳动生产率更快地提高，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

### 安排生产方面的几个问题

在安排生产方面，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上海全市到每一个工厂，都要把生产任务、生产计划布置好，安排好。安排生产，首先要抓重点。必须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过关。纲举必然目张。重点是生产计划的中心。抓起重点项目、重点

产品，其他各项才有可能带动起来。其次，要抓得具体。生产计划从制订到完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不断前进过程。不同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领导人员必须经常地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矛盾的各个侧面及其主要方面，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不这样，远远地





望一望，就动手解决矛盾，这是很危险的。

在安排生产任务和生计划时，必须注意克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例如，机械工业中的浇钢和锻压等，必须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因此，在挖潜力的同时，要抓紧这些薄弱环节的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突击，保证如期完成，以改变目前浇钢、锻压赶不上而影响生产的情况。

此外，还必须注意搞好各方面的协作关系。上海工业企业中全能厂很少，各方面的协作关系很复杂，这里有市内的协作和全国的协作，这些协作关系都要安排好，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第二，原料、材料供应的问题要认真抓好。今年上海原料、材料的供应在第一季度还是有困难的，第二季度也还会有些困难。可是从全年来看，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的材料供应情况将要比去年好得多。去年钢材只有几百万吨；今年上千万吨。还有许多原料、材料，今年在生产方面都有很大的增长。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大家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许许多多节约原料、材料、找代用品的经验，这对今年有很大的用处，要更好地运用它。在每个工厂仓库里，材料和废料是不不少的，要很好地利用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年在原料、材料的供应上什么困难都没有。怎样解决原料、材料供应问题呢？

首先，要积极组织原料、材料的调运和生产。中央分配给上海的原料、材料，我们要积极地到各地去组织调运工作。人家有困难，我们帮助别人解决，不要坐着等人家送

来。中央没有分配的，我们要自己组织生产。没有电石，就生产电石，“三酸”“两碱”不够，就去组织生产；洋设备没有，就搞土法生产。总之，要积极发展原料、材料的生产。

其次，要大力节约原料、材料，切实进行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上海市委提出要节约原料、材料百分之十，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要节约原料、材料，但是决不允许偷工减料，必须保证质量，而且要使质量越来越好。节约原料、材料的门路是很多的。要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出发，改进产品设计，改变操作方法。在节约原料、材料当中，特别要注意废料回炉，变无用之材为有用之材。许多土铁土钢，只要掌握它们的性能，配料比例适当，多化点焦炭，经过回炉，就可以变成好铁好钢，增加钢材。所以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来节约原料、材料。有的同志说，实行“全国一盘棋”以后，“机动性”少了，以物易物不行了，千方百计也无法可施了，这是不对的。以物易物是不允许了，可是，还是有计可施的，还是可以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用同样的原料、材料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下列一九五八年若干主要产品在同一行业中单位消耗的比较，就可以看出节约原料、材料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电力工业中每度电标准煤耗量：

最高	0.597 公斤
最低	0.474 公斤

钢铁工业中每吨平炉沸腾钢耗用生铁：



最高 855 公斤

最低 824.36 公斤

每噸平爐沸騰鋼耗用廢鋼量：

最高 218.91 公斤

最低 100 公斤

橡膠工業中每千雙膠面皮鞋耗用橡膠量：

最高 178.513 公斤

最低 145.62 公斤

造紙工業中每噸凸版紙用漿量：

最高 1,097 公斤

最低 857.42 公斤

每噸膠版紙用漿量：

最高 946.56 公斤

最低 844.59 公斤

紡織工業中42支棉紗每件用棉量(混用棉)：

最高 225.55 公斤

最低 201.05 公斤

每千公尺2321市布用紗量：

最高 142.45 公斤

最低 133.75 公斤

原料、材料的綜合利用的工作，應該切實地廣泛地進行。許多原料、材料可以綜合利用。例如，上海木料的利用率最初不到百分之五十，去年抓了一下，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了，但是還有百分之三十浪費了，

還要想辦法去綜合利用。任何一個工廠，不分大小，原料、材料如果能綜合利用，潛力是有的，只是大、小不等而已。

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節約原料、材料，綜合利用原料、材料，就是節省產品的物化勞動，用一定的原料、材料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就是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內容之一，千萬不能等閑視之。

此外，還要儘可能採用代用品，製造新的材料。

有些工廠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如果一時不易解決，那就應當利用生產不太緊張的情況，秣馬厲兵，進行設備調整，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準備在原料、材料問題一旦解決之後，更好地進行生產。

第三，在安排生產中，還必須抓緊、抓好產品質量問題。產品質量不合規格，就不可能全面貫徹多快好省的要求，就要造成最大的浪費。保證產品質量合格和不斷提高，首先必須發動群眾，人人負責，從車間、科室到小組、個人的生產計劃中，都必須規定保證產品質量的具體措施。其次，必須切實執行產品檢驗制度。凡是不合格的产品，一律不許出廠。

### 把群眾的革命干劲進一步發動起來

我們主張的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質上就是多快好省地發展工業生產力的問題。同樣數量的工人，經過技術革命、設備更新和改進生產組織、勞動組織之後，

就能用更少的勞動時間（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節約），生產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產品（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從而為擴大社會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福利創造物質基



础，这难道不是多快好省嗎？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鼓足革命干劲，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的问题，也是发扬科学分析精神，掌握客观规律的问题。试问干劲不足，迷信不除，科学分析精神没有树立起来，怎能做到多快好省？当然，归根到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才能求其实现。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不易之理。

当前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鼓足干劲的问题。

目前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群众的干劲很高，不待领导发动，他们就敲锣打鼓热烈响应市委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号召，动起脑筋来了；相形之下，有些干部有点落后于形势。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群众的干劲很高，我们应当积极地赶上去。不然群众就会不满意。二是有些干部，自己的干劲很高，但是不知道怎样把群众的干劲更好地鼓舞和组织起来。他们自己有了干劲，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不多，又不放手发动群众大家一道来找关键、想办法。他们有的是心急如焚，但是不知从何下手；有的是急不暇择，做事不和群众商量，光想用发号施令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这都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我们要有干劲，我们的干劲同群众的干劲结合，又可以把群众的干劲进一步地发动起来。我们的同志都需要学会在新的形势下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我们党提倡的干劲是苦干、实干、巧干相结合的干劲。只有苦干、实干、巧干相结合，才能达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没有苦干的精神是不行的。但是，苦干主要是指同困难作艰苦斗争的气概和毅力。“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没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是不行的。有的同志把苦干只是看成不分白天晚上地干，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实干是什么呢？就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干，不是空喊，不是浮夸。所谓冲天干劲，就是说，干劲是冲天的，但无论如何要脚踏实地。这也就是“顶天立地”。不顶天，不立地，两脚吊在半空中，随风飘荡，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坚决反对个别干部用专做产值高的产品，甚至用偷工减料、降低质量等投机取巧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的提高，是虚假的现象，而且根本违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巧干，就是集中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我们要把苦干、实干、巧干这三者结合起来，这种干劲越大越好，有了这种干劲，我们就能百折不挠，无往而不胜；不但能够实现一个人作一个半人的事、一小时作一个半小时的事，而且将来还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基本上不增加工人的条件下，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途径，一定可以使上海的工业生产在一九五九年继续用高速度向前发展，实现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



# 大型厂矿的“綜合經營”

★ 牛 中 黃 ★

在去年我国全面大跃进中，出现了許多新事物，給經濟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很多新的、重要的研究課題。在工业方面，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就是其中的一个。

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工业的大跃进，对于人力和物力提出了大量的需要，而現有的人力和物力却不能充分地滿足这种需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作許多方面的努力，而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則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大型企业根据需求和可能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可以使它更加合理地利用人力和物力，增加产品产量，发展多品种生产，以适应大跃进的需要。

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扩大、改建或者新建本厂的某些車間、工場，增加新的产品；另一种是办“卫星”工厂，为扩大本厂的生产服务，这种“卫星”工厂，一般多是小型的。許多大型企业向联合性的綜合企业发展，往往兼有这两种形式。而不管哪一种形式，它們都同本企业的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說来，就是：第一，利用本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出的废材、废料、废气、废水，进行加工，制成有用的成品，滿足本

企业的需要和供应市場的需要；第二，过去依靠外厂协作生产的某些附件和配件，現在根据可能的条件由本企业組織力量来生产；第三，本企业所需要的某些原料、材料，如果就地可以取得，即由本企业組織力量自行采掘和进行初步加工，不象过去那样完全依靠外厂供应。

这里，可以举出北京长辛店机車車輛厂做例子。

这个工厂在去年大跃进中发展多品种生产和举办“卫星”厂的情况如下：

在发展多品种生产方面，制成四百厘米的軋鋼机一套，正在安装，另一套六百五十厘米的軋鋼机正在制造，同时，还制成四点五瓩的电动机一百部，制成总容量为二千七百千伏安的变压器，制成三百部簡易机床。这些都是这个厂从来没有生产过的新产品，它們基本上是靠現有的車間，或者对現有車間稍加扩充以后生产出来的。

这个工厂从去年十月份起，还陸續举办了一些“卫星”工厂。这些厂大部分是在利用废料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厂址大部分設在本厂，工人几乎全部都是本厂的职工家屬，少数技术工人由本厂抽調支援，材料費和人工費由“卫星”厂单独核算，管理



費用与本厂分摊。

这个工厂所办的“卫星”厂，主要有以下一些：(1) 酒精厂，利用本厂木材加工过程中所出的木屑制造酒精，可以满足本厂的需要；(2) 棉紗卷厂，利用本厂的废油棉紗翻新，基本上可以满足本厂的需要；(3) 废銅洗选厂，利用本厂的废銅末，加以洗选利用；(4) 电石厂，平均日产量两三吨，能够解决本厂大部分需要；(5) 矽铁厂，由于缺电，产量不稳定，質量稍差，能满足本厂一部分需要；(6) 水玻璃厂，平均日产量一点五吨，能满足本厂大部分需要；(7) 炼焦厂，日产十余吨，基本上可以满足本厂需要；(8) 水泥厂，利用本地的石灰石烧制，为本厂的扩建服务；(9) 炼鋼厂，在去年大炼鋼鉄的运动中兴办起来，有一个五立方公尺的炼鉄小高爐和一个电爐、一个轉爐在进行生产。电爐和轉爐都是用本厂加工后的碎鋼鉄作原料。

从长辛店机車車輛厂以及其他許多工厂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优点：第一，它克服了本企业在原料、材料和附件、配件供应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使生产得以大跃进；第二，它生产了許多新产品，不但满足了本企业的需要，甚至还以一部分供应其他单位；第三，它广泛地吸收了职工家屬参加生产，把消费者变为生产者；第四，它充分地利用了本企业的废物，变无用为有用。同时，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在一个企业内部具体地体现

了党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样，就使上面所說的那些优点更加能够充分發揮出来。

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的趋势，毛澤东同志早在去年九月間就已經預見到，他在武汉視察时就指出过：象武汉鋼鉄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綜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鋼鉄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sup>①</sup>毛澤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很快就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巨大的物質力量。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当然，这也不是說，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新事物，同任何新事物一样，当它最初出现在人們面前的时候，总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怀疑。例如，有人把它看做是“不务正业，妨碍本行”；看做是“权宜之計，不能持久”；甚至認為这种做法“不合科学，一定失败”。

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不是“不务正业”，会不会“妨碍本行”呢？这要看是怎样的做法。如果只顧“副业”，不顧“正业”，或者放松“正业”，这当然会妨碍本行。例如，有的棉紡織厂不是首先集中精力紡好紗，織好布，而是用大力去生产机器，生产水泥，这样做，显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如果为了发展“正

① 見 1958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第 1 版。



业”而发展“副业”，那末，这种“副业”的发展，就不但不会“妨碍本行”，反而还可以促进“正业”的更大发展。许多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正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它的主要产品当然是钢铁，但是，它要进行大规模的炼铁、炼钢的生产，就需要大量的焦炭，就要有很大的炼焦厂。而有了炼焦厂，就可以从炼焦的过程中回收许多种有用的化学工业原料，来办各种化工厂。同时，炼铁的高爐，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爐渣，这种爐渣，对钢铁企业本身来说，是一种废料，但它却是制造水泥的极好的原料，办个水泥厂来利用这种“废料”是再合算不过了。还有，每个大型钢铁企业，都附设有很大的机械修配厂，这种机械修配厂不但能够修理冶炼设备和轧钢设备，而且，稍加发展，还可以自行制造一些机械设备，如此等等。象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它们的主要产品虽然是钢铁，但是，它们同时又生产化学肥料、焦油、苯等多种化工产品，生产水泥，生产机器。这种综合经营，不但不妨碍钢铁工业的发展，反而有利于它的发展，并且还可以合理地利用物质资源。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

是不是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一种“权宜之計”或者“不合科学”的事情呢？我们的回答相反。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许多大型企业之所以要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这不但是为大跃进的形势所迫，不但是因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比一般

的企业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而且还因为企业的专一性是相对的，专一和综合或者联合是对立的统一。

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大生产，日益向着分工愈细的专业化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任何一种现代工业产品，它的生产过程，都是各种专业的联合过程。专一和联合，这是所有现代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矛盾的統一。例如，象前面所列举的长辛店机车車輛厂，它的生产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即以机车車輛的制造而论，它不但有钢铁结构，而且还要有木结构。钢铁结构的制造，就需要有炼铁、铸铁，炼钢、铸钢，热加工，冷加工等过程；木结构的制造，也需要有干燥、锯木、刨光、成型、油漆等过程。由此可见，生产日益向专业化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种专业进一步密切结合的过程。生产愈专业化，愈要求综合化和联合化，这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和综合化、联合化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在任何一个工业生产部门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那种把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看做是一种“权宜之計”，看做是“不合科学”的事情，是没有根据的。

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是各具特点的。比如，根据可能的条件，钢铁企业可以办点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机械工业等等；机械工业可以办点炼铁、炼钢的工业等等。也就是说，每一种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都是同该部门



的生产技术的特点相联系的，而不应当“样样求全”，想办什么，就办什么，这也要办，那也要办。目前许多大型企业为了解决原料、材料和配件的需要，大办各种“卫星”工厂，这种干劲是好的；但是有些企业不顾本部门工业生产技术的特点和可能的条件，存在着“样样求全”的偏向，甚至根本没有条件去办的事情也要去办。例如，有些企业的所在地区，既没有煤，又没有铁，但却硬要去办钢铁工业，这就是不妥当的。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方向发展，一定要注意可能的条件，一定要注意就地取材，就地取人，做到经济合理。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有的同志认为他们所办的土法炼焦厂和耐火材料厂不怎样经济合理，就是因为资源和运输条件不利。炼焦厂的煤要从河北省的峰峰煤矿和开滦的沽冶煤矿运来，而且都是原煤，需要自己洗选，运量大，费钱多，出焦少（约三吨原煤才能炼出一吨焦炭），并且质量也不好，影响铸铁的质量。耐火材料厂用的矸子土，要从山西省运来，也不合算。这种看法是完全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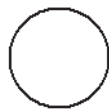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既要考虑需要，更要注意可能。只看到需要，不看到可能，这是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使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不能做到经济合理。只看到可能，不看到需要，这也是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同样使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不能经济合理。因为不按要求生产

是一种盲目性的生产，它同计划经济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很明显，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本企业不需要，社会上也不需要；或者虽然合乎需要，但是浪费极大，成本很高，那么，这样的生产是不能继续下去的。

在考虑需要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本企业的需要，而且要考虑社会的需要。有些企业的废料加工，从本企业来说，不一定是迫切需要的；但是，从社会来说，却是非常需要的，不能因为本企业不需要，就不积极利用这种废料进行生产。同时，不但要考虑到今天的需要，而且也要考虑到将来的需要。有些是今天需要的，将来就不一定需要，有些是将来需要的，今天就不一定需要，要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对待。例如，有些企业所需要的原料、材料或者协作件，由于大跃进，暂时改变了原有的供应关系和协作关系，但是，在过一个时期之后，原有的供应关系和协作关系还可能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卫星”厂或者扩建本厂的某些车间，就要十分慎重，不能因为一时的需要而盲目发展。

在考虑可能的时候，也要区别现实的可能性和非现实的可能性。对于那些目前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就应该积极地去创造条件，而不要立刻勉强地去做；对于那些经过努力确实可以做到，而且又比较经济合理的事情，就应当努力去做。

总之，要把需要和可能辩证地统一起来，使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真正做到经济合理。



# 科学与生产

刘 仙 洲

科学这一个名詞，在欧洲文字中的原义是“知識”。而知識的基本来源是人們生产活动的实践。人們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实践中，随时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主观願望上想着怎样做，而力量上做不到。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远古的人类开始先創造出简单的石刀石斧等原始工具。从那个时期起，人类就掌握了具有“刃状”的工具能够帮助他們做工的知識。就科学上的意义說，从那个时期起，人类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掌握了“尖劈”这一种简单机械可以“用小力发大力”的知識。后来許許多多的具有刃状以及具有錐形的工具，都是从这些知識发展出来的。到了农业时期，因为播种和收获都具有季节性，需要了解天时，而天体运行及寒来暑往等現象，又最容易为人类所观察和感觉，于是初步的天文历法等知識就首先发展。所以就自然科学的发展史看，在任何民族中，天文历法等都是发生最早的。埃及在紀元前四千多年已有使用历法的記录。我国在殷代（紀元前1401年到紀元前1122年）遺留下来的甲骨文里边，也有

不少有关天文历法的簡單記載。在我国几千年的科学发明里边，发展的水平比較高，发展的時間比較早，至少在十四世紀以前，总占在世界领先地位的是水力渾天仪和天文鐘。从汉代张衡开始，唐代僧一行、梁令瓚更进一步，宋代苏頌，元代郭守敬等繼續有所增益。他們的主要目标，都是要准确地制定全年的季节，以便“授时”，即指导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适当时期。因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需要寻求天时周期的規律，以便适时的播种和收获。

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一書中曾說：“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这是科学来源的极其正确的論断。

我国現在仍有传本的古代数学書，最重要的一种是“九章算术”。它的内容包括二百四十六个应用題目，分别隶属下列九章：第一章，“方田”，主要是关于地面面积的算法；第二章，“粟米”，主要是关于由粟求米、由穀求粃及粮食交易等的算法；第三章，“衰分”，主要是关于按等級比例配分的算法；第四章，“少广”，主要是开平方开立方等算法，也是有关計算面





积问题的；第五章，“商功”，主要是关于体积的算法；第六章，“均输”，主要是关于政府征收食粮的算法。其余三章，“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也多是直接间接和生产有关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算术和初等几何的产生有这样的说法：“和其它所有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们的实际需要上产生的；是从丈量地段面积和衡量器物容积，从计算时间，从制造工作中产生的。”我国数学的发生恰恰合乎这个论断。

在我国历史上，对于耕种技术和农具等有不少发明创造的人应该首推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的赵过。在“前汉书”“食货志”上说，在汉武帝末年（约公元前90年左右），因为连年用兵的原故，国家积蓄很少，他下诏力求增加农产，使赵过为搜粟都尉（相当于我们的农业部长吧）。赵过发明了轮种制度，并在中耕除草的同时，逐渐向苗根培土，使作物能耐风、耐旱。在农具方面，他对于耕田、耘草和播种等方面也都有新的创造。结果能使一亩的产量比按照旧方法耕种的增加五斗以上，有的甚至能增加一石以上。到昭帝时（公元前86年到公元前74年），开辟的土地和粮食的积蓄就都大量的增加。到宣帝时（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49年），连年丰收，谷的价格每石低到五钱。<sup>①</sup>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赵过的发明创造完全由于当时国家对农业增产的要求，后来他也确乎是达到了大量增

产的目的。我国对于利用水力为原动力的发明，应该首推东汉光武帝时代（公元25年到公元57年）的杜诗。在“后汉书”“杜诗传”上记载着，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的时候（公元31年），杜诗被调到南阳当太守。他节俭清廉，又善于计划，爱惜民力。因为当时鑄造铁农具的任务很大，用人力鼓风费人力过多，他就创造了一种用水力为原动力的“水排”来鼓风。用力很少，收效很大。<sup>②</sup>就科学上的意义说，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能够发明利用水力拉风箱，帮助冶铸，大量鑄造农器，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使他做出这样发明的动力，也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生产铁农具的需要，用旧日的人排和馬排（用馬力拉风箱）已有相当困难的原故。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科学能够有高速度的发展，恩格斯也是归功于生产。他在“自然辩证法”“科学历史摘要”一书中

① 前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苗生叶以上，稍耨隳草，因隳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隳尽而根深，能风与旱。……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魏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至昭帝时，……四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

② 后汉书杜诗传：“（建武）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鑄为农器。（原注：冶鑄者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地。郡内比室殷足。”



写着：“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漫长黑夜之后，科学以梦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也得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去年我国农业部编印的“农具图谱”，其中共有：动力机械、排灌机械、施工、运输、加工、畜牧、林业等各方面的农业机械三千五百多件。据统计，其中百分之五十八，即两千件以上是最近一两年工具改革运动中群众改革创造出来的。而且无论就数量和质来说，都超过过去两千年的成就。这也是因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迫切要求的必然结果。

根据清华大学过去在工程技术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形看，也完全可以证明生产是科学的丰富源泉，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离开生产的推动，科学研究就很难做出成就。从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成立工学院起，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的十七年中，教师们在工程技术方面共发表了大约一百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科学成就的介绍和综述，其中有实验结果的不到十分之一，有七篇完全是翻译的。解放以后，国家经过了三年经济恢复工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对于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有所推动。首先是水利系，因为它一开始就接受了若干对国家工业建设有关的研究试验题目，如官厅水库、丰满水电站、包钢沉沙池及刘家峡水利枢纽等。其次是土木系、机械系和电机系，也是因为接受了若干对

国民经济有迫切需要的研究问题。自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人数和科学研究的項目都继续有所增加。并且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系和各教研组所选的科学研究题目，凡是结合国家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都得到比较好的成绩；不结合国家生产的，结果成绩就很差，甚至毫无成就。到一九五八年，因为全国工农业大跃进，学校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就更好地推动了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工农业生产不断向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促使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加速发展并为它服务。同时生产实践又不断丰富科学研究的内容和向它们提出新的要求。这样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就使学校科学研究工作走上无限广阔的道路。有不少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都是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前所不能想象的。生产能够推动科学的发展，就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看，又得到了一次充分的证明。

## 二

以上是说明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依靠于生产的发展。但是当人类掌握的科学成果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其中有一部分尤其是所谓基础科学的理论部分，有时不是很紧密地或立刻地和生产联系在一起。它往往是或远或近地走在生产的前



边，为新的生产任务探索道路，或是使我們的理性知識提高到更高的阶段。几年，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以后，經各方面科学进展的融会貫通和各方面实际需要的迫切要求，才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的生产服务。在科学发展史上，这样的实例是不不少的。例如：原子核物理，在一八九八年，当居里夫妇初发现放射性物質时，談不到对当时的生产有多大关系。但在今天它影响的范围竟是如此广闊，而且正在发展。再以半导体的发明和发展为例：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半导体硒的整流及光导等作用已被发现，但是一直到几十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无綫电雷达技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高頻检波器时，才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在各种科学的領域里边，尤其是它們的基础理論部分里边，常常能由一个极简单极整齐的定律或公式，表达一个极其广泛的定理。有时更能互相启发、互相推演，由原有的公式导出其他新的公式来。它們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們有的是由生产实践开始，有的即使不是直接由生产实践开始，也是在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經過实验証明，然后总结出来的。这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联系实际的理論”。因为它們是联系实际的理論，就一定經得起实践的考驗，而且經過一定的時間以后，它們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为生产服务。

就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論为例，它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早在相对論提出以前，

就已經有人根据电磁波传播的实验結果，証明不能用原有的理論（牛頓的速度合成定理）来解释，并且指出，为了解释得通，除非是否定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的概念。爱因斯坦就是根据这样的論据，勇敢地对經典力学和传统的对時間空間的概念提出怀疑而完成他的相对論的。可以想見，如果没有实验，新的理論是不会凭空成立的。

李政道和楊振宁对于量子力学方面三十多年来被大家公認的宇称守恒定律加以修正，也是由于有一些实验事实，从宇称守恒定律的观点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并且知道：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定律是經過許多实验得到了証明的，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只是按照推广的看法，認為它也是适用，并没有实验的依据。因之，就怀疑到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就不守恒。后来經吳健雄把鈷60冷却到絕對温度  $0.01^{\circ}$  的低溫之下，得到証实，这一修正才完全成立。

由以上所述的情况看，可知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当开始和繼續推进时，主要是由生产上的需要。到科学成果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有一部分所謂理論性的科学发生，但是它也必須是在原有的經過实践或实验証明的基础上，再一步一步地經過实践和实验的証明，也就是說“理論必須联系实际”，才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理論。而且这种理論，或迟或早总可直接或间接地达到为生产服务的阶段。



### 三

过去几年以来，我国有一部分科学家，尤其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科学家，对于科学和生产的關係抱着完全錯誤的看法。在他們看起来，理論是同生产实践不相干的，凡結合生产的科学研究問題都沒有創造性。他們接受了过去一两千年我国讀書人的传统偏見，存在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坐而論道謂之士”等錯誤观点；他們多是出身于地主或資本家的家庭，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的实践；有的更加上接受过欧美資本主义国家个人主义的科学研究訓練。他們輕視生产，提出所謂“生产低賤論”，認為“生产是粗活”，認為科学研究題目一結合了生产，就会降低水平。結果即使遇到对社会主义建設或对国民經济有十分迫切需要的問題，他們也認為理論性不高，不願担任这种問題的研究工作。甚至需要实验工作較多的題目，他們也不願意作，認為这样的題目都不够“理論”。例如：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东北丰满水电站为了提高輸送到沈阳工业区的电力容量，要进行一些試驗研究。这本是对国民經济有相当意义的問題。但是，当电力工业部派人来清华大学接洽时，有关教研組的主任却認為他們用的电压只有二十二万伏，没有什么新理論問題而拒絕接受。而他自己却选了有关四十万伏电压的电力輸送問題作为科学研究題目。結果只是作了若干

不切实际的假設，推导了許多数学公式，并不能解决对当时來說有迫切意义的問題。总之，他們是把科学怎样发生和怎样发展的正确传统完全抛开，認為只有脱离实际的“理論”才是科学。他們宁可在資本主义国家杂志夾縫里边去找題目，也不願研究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更加严重的是他們为了快出論文，就从自己的头脑中任意地不切实际地“假設条件”，再根据自己假設的条件作些数学游戏，使外行人看了，真是“莫測高深”。这样就使科学研究工作整个离开了正确的方向。例如：清华大学水利系某个右派分子一向不承認“知識的来源是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是一些“紙上談兵”，作些“数学游戏”。一九五六年，为了申請科学奖金，他竟用所謂“相关法”創造了一个“汉口夏季雨量的公式”，即：汉口夏季的雨量 =  $0.35 \times$  上海五月間的风速 -  $0.49 \times$  长春四月間的气温！把三个相去几千里不同時間和不同性質的数据主观地硬凑在一起，算做他新发明的一項規律！

应该深刻地引为教訓的是：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到反右派斗争以前的一段時間里，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于科学研究的評價，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些人的欺騙，过于重視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論，而对于真正对国民經济有很大貢獻的科学研究成果反重視不够。結果对于大部分青年学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研究方向和方法，发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自从反右派斗争和进行科学研究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以来，对于前边所说的一部分所谓“科学家”轻视生产，专门重视不切合实际的理论，只注重个人名利，不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多数科学工作者的头脑中，错误观点已得到了大大的纠正。为了不致再发生偏差，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应当经常加以注意和批判。但是又有少数人偏到了另一个方面去。他们认为：既然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决定于生产，那么，只有生产中能出科学，理论的研究就不必要了。清华大学自去年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有少数人在思想上就发生了这样的错误想法。他们认为学校大搞生产劳动，既可为国家生产必要的产品，又可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那么，纯理论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甚至理论课程的学习都可以不要了。有少数学生也确实发生过轻视课堂理论课程学习的现象，这种偏向很快得到了纠正。

在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只要是结合实际，联系实际的，只要是一步一步地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验证明来的，那就是应当重视的，这在前边已经说过了。在学校中学习理论课程，则更是不应轻视。因为任何一门课程里边的正确理论（不正确的当然应加以批判）都是经过前人的实践及实验所总结出来的规律，学生学习了它，可以省去不少自己摸索的时间。这正是国家建立学校以培养后一代的主要原因。若认

为任何知识都要自己从头由生产实践中去摸索，那当然是错误的。

又有个别直接担负生产任务的人错误地认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是由生产所决定，那么就专心致力于生产工作好了，不必再搞什么科学研究工作。这也是错误的。因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虽说是由生产所决定，但是科学的成果却会转过来大大有助于生产。在人类整个的历史上属于这一方面的实例是很多的。科学与生产有互相启发，互相推动的作用。人类社会愈进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愈高，需要科学研究工作的范围也就愈大。因为，过去科学的成果是自然规律的知识的积累和间接知识的宝库，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又是进一步向前摸索的工作，它们对于目前和今后的生产都有极重要的关系。就各种工程技术科学说，它们都具有创造新产品和扩大生产力的作用，因之也就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任何一项技术革新或工具改进，都能够提高生产率几倍到几十倍。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下，这一类实例很多，不待详述。就有关农业的各种科学来说，如农艺、植物生理、育种、土壤、昆虫、化肥、灌溉等，更是直接有助于农业生产的。一种小麦育种的研究成功，每年就能够为国家多生产若干亿斤的小麦。所以直接担负生产任务的人，更是决不可轻视科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不然，就和少数轻视理论课



程学习的学生一样，也偏到另一方面去了。

#### 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和社会制度有密切关联的。根据生产上的需要和要求，在科学上有所发明或有所发展，当一开始的时候，总会对于生产有提高的作用。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操在剥削阶级的手里，凡有显著利益的事，总容易被剥削阶级所注意并设法抓到他们的手里去。我在整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在我国封建时期的晋唐两代，对于水碓、水磨、水碾等能提高人民劳动生产率的发明，有很显著的垄断事实，以致大大引起人民的不满。我国利用水力当原动力以帮助人民工作，自东汉初年即已开始。前边说过的杜诗发明用水力拉风箱和桓谭“新论”（桓谭也是东汉光武时人）上记载的“役水而舂，其利百倍”，就是证明。不久，到了晋代（第三世纪前后），不但发生了被大官僚和大富豪垄断的情形<sup>①</sup>，同时更发生了只顾剥削阶级的利益，对人民反而有害的结果<sup>②</sup>。到了唐代，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根据“唐会要”及“旧唐书”上的记载，这些本来是有助于人民生产的发明，被当时的“王公”、“公主”和“寺观”等加以垄断<sup>③</sup>。可见，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往往是服务于少数有权力的剥削阶级，对多数人民有时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在资本主义的开始阶段，科学与生产的相互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即生产上的要求，大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转过来也推动了生产的前进。但是当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科学与生产之间的相互推动，一方面虽说仍发挥着它的一定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下列几种弱点，就发生了一定的“停滞和腐化的趋势”

- ① 晋书王戎传：“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太平御览卷762引晋书：“王戎为司徒，好治产业。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世说：“王戎既贵且富，区宅水碓，洛下莫比。”王隐农书引王隐晋书：“石崇有水碓三十区。”
- ② 晋书卷46，刘頔传：“……转任河内。……郡界多公主水碓，温塞流水，转为浸害。頔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
- ③ 唐会要，卷89，碾碾条。“开元九年（721年）正月，京兆少尹李元献奏，碾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碾渠立碾，以害水功。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至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折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大历十三年（778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合废拆，总四十四所，自今以后，如更置，即宜奏。其年正月，坏京畿白渠八十余所。先是，黎干奏以郑白渠碾碾阻隔水利，人不得灌溉。请皆毁废，从之。时升平公主，上之爱女，有碾两轮，乞留。上曰：‘吾为仓生，尔违吾意，可为众率先’。遂即日毁之。”

旧唐书郭子仪传：“大历十三年（778年）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碾，以防民溉田。升平公主有脂粉碾两轮，郭子仪私碾两轮，所司未敢毁彻。公主见代宗诉之。帝谓公主曰：‘吾行此诏，盖为仓生。尔岂不嫌我意耶？可为众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势门碾碾八十余所皆毁之。”



(参考“列宁全集”第22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多成了各个资本家的“专利”,不能广泛地被人民所采用。有的资本家甚至买了专利权,加以封锁冻结。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二)科学家们从事研究工作,往往从自私自利的个人名利出发,相互隐瞒,这样就很难采取集体研究的方式,但是晚近以来,凡是重大的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又决不是少数人,甚至决不是少数专科所能胜任的。(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为资本家的高额利润服务,因之很难动员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因为具有这些根本性的无法克服的弱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到一定的阶段以后,科学技术是很难再有高速度的发展,他们将越来越落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后边。

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进步的科学技术成就都能被广泛地采用,成为全民的财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更是大力提倡集体方式,甚至尽力吸收所有有关群众的智慧。而人民又因为认识到这些工作都是为集体谋利益,为社会谋利益,为国家谋利益,甚至为全人类谋利益,所以积极性就能大大地提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具体表现,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所不能有的。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高速度发展,远远地把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抛在后边,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国在过去几年中,尤其是在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中,各方面的科学技术都有高速

度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我国目前正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完成,不仅关系着我国繁荣富强的前途,关系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它还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帝国主义阵营力量的对比和全人类进步事业的早日实现。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条件主要是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大大提高。这样,一方面就形成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推动力,一方面也就需要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加倍努力,以推动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回顾建国后十年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科学工作方面的领导和所指出的方针都是十分正确的。这在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聂总理历次对科学工作的报告和发言中,都可以看出。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和应担负的任务相比是很不够的,所以总的科学研究方向,应当主要是为当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一部分科学家从事和当前的生产实践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研究,为新的生产任务探索道路,也是同样的重要。这种研究,当然是要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下进行。直接担负生产任务的人,也有必要同时注重科学研究工作。我相信,在我国社会主义工农业高速度发展的推动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对科学发展无比优越性的条件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定会得到辉煌的成就。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副校长)



# 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

——紀念“五四”四十周年——

胡繩

新中国建立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广大知識分子，不断地开展着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通过这个过程，多数知識分子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并不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才发生的。早在四十年前，五四运动的时期，已經有一批知識分子摆脱了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离开了他们所出身的阶级，走到了工农群众中间。他们是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行自我改造的第一批中国知識分子。以后，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繼續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因为他们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压迫，渴望改变落后、贫穷、被压迫的中国现状；而他們发现，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离开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知識分子中的先进分子都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

思想和哲学思想支配下面。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經宣告失败，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經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已經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所以从五四运动开始，历史就向中国的爱国知識分子提出了一个自我改造的任务。

五四运动以来，最先进的知識分子，不願反动統治势力的残酷迫害，克服了走向工农群众中去的种种困难，勇敢地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們中有許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是中国革命知識分子的光辉模范。

但是，在旧中国，大量的知識分子仍旧束縛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中间。他們中的許多人，虽然在一个时期由于他們的爱国热情和政治敏感而参加了革命，但是因为他们有害怕人民的倾向，并且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往往又退出革命，而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犹疑不定。有一小部分人甚至走进了反革命营垒，成为人民的敌人。在那时候，也有不少坚持民主主义立場的知識分子，通过自己的经历而逐渐看出





了：如果不去依靠工人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全国解放以后，阻碍知识分子进步的反动统治势力已经灭亡。资本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资本家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也逐步地在基本上消灭了。知识分子亲眼看到了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看到了只有依靠社会主义、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成为一个广大的潮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愿意积极地为改造自己而努力。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在自己思想中的一个革命，在改造过程中，不免要经历许多矛盾和困难。这是新生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在克服这种矛盾和困难之后，就会真正感到心情舒畅。当知识分子保持着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往往并不是舒畅的。在旧社会，人们常常说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其所以痛苦，就因为他们在革命以外彷徨，而听任旧社会安排自己的命运。在新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积极地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改造，那就是长期保留着自己的落后思想和周围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面前，也往往会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和在积极地改造自己思想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是根本不同性质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懂得了人们必须服从客观真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道

理；积极地进行自我改造，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和执行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共产党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同时积极地帮助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有人以为，既要团结，又要批评，这是自相矛盾。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向知识分子指出了他们的长处，也指出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无产阶级尊重知识分子，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尊重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而对于他们身上的个人主义的坏东西，当然不能加以尊重，而且要通过思想斗争帮助他们克服这些病毒。这种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不免是尖锐的；但是尖锐的斗争仍然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共产党诚恳地帮助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因失败而沮丧的时候，勉励他们前进；当他们有了某些成就而得意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骄傲；当他们迷失道路，彷徨无措的时候，为他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所以许多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懂得了共产党是他们的最好的诤友和唯一可靠的引路人。

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想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尊重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文化知



識，而是竭力頌揚知識分子身上脫離人民群眾的各種惡習，鼓勵這種惡習，以便予以利用。前兩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也是用的這種方法，他們裝模作樣地把知識分子說得好象身上每一個細胞天生都是聖潔的。實際上，他們是想把知識分子拖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骯髒泥坑中去。

在一九四九年，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擁護人民共和國；而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發動的風潮中，結果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在廣大知識界中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事實證明，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以及他們的代理人是徹底失敗了。這就是因為，真理不在他們的手里。無產階級是依靠真理，把廣大知識分子吸引到自己這一邊來的。跟着真理走，這是中國的愛國的正義的知識分子的光榮傳統。

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因為過去的教養和經歷的不同，以至受年齡等等的限制，在自我改造中能夠達到的水平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在全國解放後，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首先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就是劃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同人民大眾之間的界限。對於許多知識分子，認清帝國主義的面目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隨着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進展，又進一步產生了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在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判別是非的六條標準，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和黨的領導這兩條。這些標準也正是對廣大知識分子在自我改造中的最基本的政治要求。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曾經在右派分子進攻時發生了程度不等的動搖，他們從反右派鬥爭中受到了比較深刻的教育，看出了要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中站在“中間”地位，是毫無出路的。

反右派鬥爭還使人們看到，為了徹底解決政治立場問題，重要的是要克服那種看一切問題都從個人利益出發的習慣，克服那種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的態度。有不少知識分子為了克服自己的缺點，已經在去年工農業大躍進中開始深入群眾，定期下廠下鄉，參加勞動，從而開始改變了對勞動人民的態度，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覺悟。這無疑是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一種必要的方法。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自己的業務工作中，有一部分人具有認真切實的好作風。但也有一部分人濃厚地表現着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例如妄自尊大，強不知為知，把學術當作私產，偶有所得，就企圖加以壟斷，有個別分子甚至嫉恨別人的進步，剽竊別人的成就等等。這種壞作風是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體生活不能相容的。人們當然不應當保留這種壞作風，而應當在明確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改變了脫離群眾的狀況的前提下，努力克服這種壞作風，才能够好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



毛澤东同志說：“凡是真正願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应当給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关系，帮助他們解决各种必須解决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积极地發揮他們的才能。”这是我們党和国家确定不移的方針。

知識分子自我改造中的更进一步的問題，是要逐步地抛弃資产階級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階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应当認真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真正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有志的知識分子都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只要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有些知識分子已經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已經基本上从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轉变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但是对于許多知識分子說来，还需要一个較长的时期才能做到。因此，知識分子如果以为自己不需要繼續进行改造，停止不进，这是不对的。同时，如果在世界观的問題上要求过急，为求速效而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那也是不对的。

世界观的彻底改变，不是簡單的事情。承認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有时并不等于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馬克思主义是最革命的，也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它从来依靠自己的正确性而使人信服。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往往是經過了这样那样的怀疑，然后才信服了馬克思主义。这样的信服是真正的信服。如果不是把馬克思主义当作真理，而是在实际上用自己的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的世界观来歪曲馬克思主

义，那显然是不利于思想改造的。有的人正在努力学习馬克思主义而还没有学好，他們同那些根本不願意接受馬克思主义的人当然是不同的。但即使对于某些不願意接受馬克思主义的人，我們也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毛澤东同志說：“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不願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們就应当給他們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学术問題上，有不少在資产階級学术界做过工作的人，現在开始努力运用馬克思主义来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是很好的事情。繼續进行这种工作，不仅对于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有益，而且是为发展我国学术工作所必要的。无产階級为要建設社会主义，就必须批判地吸取資本主义的一切科学和文化成果。过去，中国資产階級学术界缺乏一个很大的发展，他們在翻譯介紹外国的学术和自己进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他們并不是一无所。把資产階級学术界的成就全部抹煞，是不对的。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一切前人的成就固然都不能簡單地否定，在社会历史、文学艺术方面，資产階級学术界所作的某些資料整理工作和某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对我們有用的。当然，在吸取他們的成就的时候，必須注意清除各种資产階級的偏見和謬見，并且克服其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用



资产阶级权威的名义来阻止人们继续前进，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应当是科学地审查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成就，不忽略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批判，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在科学和艺术工作中，我们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的艺术工作和学术工作都应当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大花园，凡是确实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作出自己的有益贡献。在许多学术问题上，还可以而且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见解，以便经过充分的自由争论，达到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也一定要通过对各种错误观点认真地展开辩论，来克服各种错误观点，这样，才能不断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方面的学术工作中得到发展。过去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的旧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学问就有可能发出更大的光辉。有些旧知识分子，虽然还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仍能在学术工作中提供在一定范围内有价值的成就，也应当鼓励他

们进行这些工作。同时应当看到，在今后学术界中还会有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其他错误思想出现。马克思主义者不害怕它们的出现，而应当在它们出现的时候，给以科学性的批判。这样，才有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也有利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四十年前开始在中国传播，当时只是为极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在这四十年中间，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得多么迅速！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已经成为我国知识界的共同的武器。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正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求进一步改造自己；一批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培养的新的知识分子正在不断地生长起来。我国的知识界的面目已经开始发生根本的改变。无论是正在进行自我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或是年青的新的知识分子，都应当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不断地向前进步。一个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巨大队伍一定能够逐步形成起来。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队伍。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为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



# 农业中学大有可为

—陈光—

最近，我們在江苏省江阴县参观了利港农业中学和后悔农业中学的教学工作，并听取了申港农业中学校长关于该校工作情况的汇报。这三所学校的基本情况，大体上相同。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教师、学生都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干劲足，热气高，艰苦奋斗，蓬蓬勃勃，显示了农业中学这一新形式学校的旺盛的生命力。从这

几所学校的办学情况，可以看出农业中学广阔的发展前途，使我们增加了无限的信心。

江苏省的农业中学，自去年三、四月间迅速大量地发展起来之后，五月份就转入巩固提高的阶段。经过整顿，多数学校已经上了轨道，一般比较巩固。利港、后悔和申港农业中学在开办之初，和全省其他农业中学一样，在物质设备、师资条件方

面，都远远比不上全日制的普通中学。当时有些人对农业中学能不能办得好，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可是在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和师生共同的努力下，这些学校的面貌，都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在公社化运动中，学校又适当地进行了集中。利港农业中学由原来的七所并为四所，后来又由四所并为一所。现在全校有六个班级，学生三百零三人，教师十一人，公社派来指导生产的老农和技工七人。后悔农业中学由原来的九所并为一所，现有学生五百零九人，教师十七人。申港农业中学由原来的七所并为一所，现有学生三百零六人，教师九人。学校过小，不利于教学和生产；过大，也不利于领导和管理。适当地把一些过小的学校加以合并集中，是完全必要的。一般说来，农业中学的规模，以一社一校（大社一社数校），二、三百人左右较为适宜，最多不超过五百人。学校从分散到集中，从单班到多班，有利于教学，有利于生产，好处很多。由于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师资加强了，教学研究活动增加了，学习和生活的条件改善了，这样，师生的干劲和信心更足，公社党委更便于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学校的思想工作、教学工作和生产工作，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农业中学是以语文、数学为重点课程。现在，利港农业中学、后悔农业中学和申港农业中学的教学质量，较初建时都有显著的提高，生产工作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上学期结束之前，江阴县文教局曾组织利港农业中学初一春季班（因为无秋季班）的学生和利港普通中学初二秋季班的学



生，就語文、数学兩門主要課程進行統一測驗。測驗結果，以總平均分數計算，語文成績：農業中學為八十點四五分，普通中學為七十四點四分；算術成績：農業中學為七十四點二分，普通中學為六十八點九分。這一次測驗的結果，使許多人感到意外。經過這次了解，我們覺得並不是偶然的。農業中學在教學工作上有許多特點。在這些學校里，開始建立起同志式的新的師生關係，教師、學生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互相交心，互敬互愛，間難釋疑，親密無間；他們都是青年人，都有強烈的共同的求知識的欲望，因而朝氣蓬勃，積極進取，共同促進，教學相長。這是一個特點。學校教師大都是新的高初中畢業生和從小學教師中抽調出來的，他們的基礎較差，缺乏教學經驗，自知知識不足，教而後知困難，肯虛心學習，刻苦鑽研。他們在教學工作中受資產階級教育觀點和教條主義的影響很少，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靈活多樣，能聯繫實際，所以教學效果良好，這是又一個特點。農業中學的學生貧雇農子弟較多，一般年齡較大，學習自覺性較高，加上一面學習，一面勞動，在學習中勞動，在勞動中學習，相互推動，相互滲透，因而理解能力較強，運用較快，知識容易消化，容易鞏固。這又是一個特點。因此，教學質量能夠較快的提高。同時，普通中學對農業中學教師在教學業務上的具體幫助，及時解決教學工作中的困難問題，也是提高農業中學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農業中學在教學上应当向普通中學看

齊，使自己逐漸接近和達到普通中學的水平，這是一個努力的方向。因此，今後農業中學必須繼續同附近的普通中學掛鉤，參加他們的教學研究活動，虛心學習他們的教學經驗，以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教學業務水平。同時，普通中學，也必須積極地毫無保留地認真幫助農業中學的教師提高教學水平，而且應當學習農業中學的有益的經驗，共同提高，共同進步。

農業中學實行半耕半讀制度，不僅要教學好，同時也要生產好。青年一代接受了現代農業科學知識，掌握新的生產技術，才能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逐步地使農村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況。這兒所農業中學在生產勞動上所獲得的成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農業中學在開始進行農業生產時，幹部和群眾幾乎都不大相信他們能搞好，少數人甚至採取否定的態度。他們說：“種田佬仍舊學種田漢的東西，有什麼用哩！”利港人民公社的社、隊幹部就擔心農業中學學生搞不好生產。有的群眾說：“農中農中，兩頭是空，學習不好，荒田祖宗。”但是利港農業中學的全體師生，不但沒有泄氣，反而更加鞭策自己，鼓足更大的干劲，將社里撥給他們的一百四十畝秧苗不壯、土質瘠瘦的三類田，改造成為一類田。他們的措施是：首先打破了認為水稻直播田不能中耕的迷信，進行了七次除草；自制土化肥，採取高溫速成堆肥法，先後追肥五次，使水稻生長茁壯；在水稻成熟期中，發生了稻熱病，發現了稻椿象蟲，他們又自制土農藥，同病蟲害進行了四次搏鬥。他



們终于获得了平均亩产干谷一千一百一十四斤的成績，超过了全社的平均产量。这一胜利，不仅鼓舞了全体师生搞好生产的信心，而且在技术推广上也对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梅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大队长周錫洪看到农业中学学生在生产上的作用，兴奋地說：“农业中学既能学到知識，又把知識推广給社員，看来，就是好在这个地方。”下村有八个学生在后梅农业中学上学，回家就向社員講解新的生产技术，社員称頌他們是“小八仙”，神通广大。現在利港的群众，再也不譏嘲农业中学学生是荒田的祖宗，而滿意地贊揚他們是“农中农中，又专又紅，学习真好，生产先鋒”了。

这些学校不仅取得了农业生产的初步成就，而且也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和副业生产。例如利港农业中学，他們为了适应公社化后对技术人材的需要，在校內分班設了农具制造、农艺、畜牧兽医、建筑、园艺、蚕桑等六門专业課，同时分专业进行生产。他們在生产上能够取得以上成績，是由于他們政治觉悟提高和用現代农业科学知識武装自己的結果。

利港农业中学和后梅农业中学能在短短一年中，做到語文、数学两門主要課程达到普通中学的水平，农作物的产量达到或超过当地的一般水平，这对我們展望农业中学的发展前途，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駁斥了所謂半耕半讀的学校学不

到东西，提不高教学质量以及搞不好生产等等的論調。农业中学和全日制的普通中学一样，都应该提高，而且可能得到提高，怀疑农业中学不能提高，是没有根据的。

总的說来，这几所农业中学的巩固和提高，是与党委的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分不开的。公社党委对农业中学采取三抓一检查的办法，进行具体领导。所謂三抓，就是抓政治、抓生产和抓生活。这三所农业中学的校长，都由公社党委書記兼任，并且配备了党员副校长。現在已經开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建党、建团工作。利港农业中学在去冬水利工地上，就发展了一名党员，二



西野作



十名团员。农业中学的生产，由党委委托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负责领导，督促检查，并经常帮助解决工具、耕畜等具体问题。在生活上，教师的工资按月发给，学生膳食也由公社加以解决。所谓一检查，就是公社党委把农业中学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在检查中心工作的同时，检查农业中学的工作；规定公社党委委员到农业中学所在的生产大队工作时，必须检查农业中学的工作，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由于党委加强领导，就保证了这些学校能够循着党所指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

在短短的一年中，这三所农业中学能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也是与全体师生发扬艰苦朴素精神，认真贯彻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方针分不开的。这儿所学校的校舍，都是比较少而陈旧的，但是利用率却很高，课堂、宿舍、猪圈、羊栏，安排得井井有条。房屋坏了，自己修建；校舍不够，就自制砖瓦，动手兴建。他们精打细算，克服物质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目前，这三所农业中学的师生正以坚强的战斗意志，旺盛的劳动热情，采取有效措施，满怀信心地向着经费三自给的方向努力。这里所说的三自给，就是教师工资、学生伙食费、学杂费和簿本费通过全校师生的劳动由学校自给。这是农业中学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农业中学经过努力逐步达到经费部分自给、大部分自给或全部自给，有没有实现的可

能呢？从利港农业中学去年的情况来看，是存在这种可能的。一九五八年利港农业中学养蚕收入四百元，羊毛收入七十六元，养猪收入二百八十元，养兔收入十一元，搓草绳收入二十五元，打芦席收入三百元，化肥、农药收入一千一百元，加上农业收入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三点四元，合计全年收入一万六千零十五点四元（这是校内劳动收入，义务劳动收入未计在内）。全年学校经费开支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二元。收支相抵，该校经费自给三分之二以上。利港农业中学由于取得去年经费自给三分之二以上的经验，今年又订出新的生产规划，全体师生一致表示要实现吃饭、工资、办公、书籍全部费用自给。他们的原则是农业、副业同时并举。要求吃饭靠农业，用钱靠副业。具体规划是：种植三麦一百三十五亩，水稻一百二十一亩，大豆五亩；手工业和副业，则从事种菜、植麻、养猪、养羊、养鱼、养鸡、打芦席、缝纫等，争取全年农副业生产总收入三万零八百九十元。实现了这一规划之后，该校就可以付出学生全年伙食费二万二千六百零八元（按每人每月平均伙食标准六元计算），教职员工全年工资五千一百六十元，办公添置费用一千一百元，学生书籍簿本费用一千二百十二元，合计三万零八十元。收支相抵，尚有益余。当然，要实现这个规划，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公社必须把这一规划纳入统一的生产规划之中，加强公社对农业中学的具体领导，并负责解决原料供应与销售问题。校内必须配备两个专职副校长，一个抓教学，一个抓生产，促使教学、生产两





高涨。我们相信，在今明两年内或者再稍为长一些时间内，在一切有条件的农业中学，做到经费大部自给或全部自给（包括教师工资，学生伙食费，学杂费和簿本费），也是可以办到的。

从利港等农业中学的情况来看，农业中学是大有可为的。农业中学是一种新形式的学校。它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产物，是在教育事业中破除迷信，进一步发展群众路线，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产物。我们说农业中学大有可为，就是说，这种学校可以满足我国人民学习文化、学习专业知识的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它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还要继续发展，而且是要有较大数量的发展。全日制的中学当然也将有很大的发展，数量将逐年增加。但是国家办学，必须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相应地发展，不可能一下子发展得太快。所以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一九五八年利港公社有应届高小毕业生一百一十二人，考入利港全日制初级中学的只有三十三人，其余七十九人都进入利港农业中学，才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一九五九年江苏省将有应届高小毕业生四十三万人，全日制初级中学招生二十二万人，其余将近一半的高小毕业生都要进入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学习。

我们要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农村迫切需要大量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力量。这些技术力量，要全部依靠全日制的

学校来培养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这就需要通过半耕半读的学校和业余学校来培养，农业中学在这方面要担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根据利港人民公社的初步计算，要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需要各种农业技术人员六百人，工业技术人员三百九十人，共九百九十人，占该社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八。在他们的规划中，农业中学要为农业、工业输送技术人员五百四十五人，占整个需要的技术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五。当然，这只是该公社的初步规划，数字是不够精确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今后农村对技术力量的大量需要和农业中学在培养各种技术人员中的责任。这种培养技术力量的任务，随着跃进形势的发展，将越来越显得重要。

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看不到这种重要性，认为农业中学占有很多劳动力，不加分析地主张把农业中学的超龄学生一律动员转入生产队。这样做，我看有研究的必要。农业中学原则上规定吸收十三岁到十六岁的高小毕业生入学。但在农业中学创办初期，为了充分满足农村高小毕业生升学的要求，曾经吸收了一部分过去三年没有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入学。这里面有一批超龄学生，他们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应该承认，这批人的入学，和解决当前劳动力的紧张，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这次，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细细地算了一笔账，发现农业中学所占农村的劳动力实际上并不很多。利港农业中学学生三百零三人，为利港人民公社全社人口二万零五百人的百分之一点四八。也





## 永远跟着毛泽东

月老作

就是说，在一百个人中，只有将近一个半人在农业中学学习。学生入学年龄在十七岁以上的八十六人，如果这些人都当作整劳动力，那末，则占该社劳动力总数六千二百人的百分之一点四，这八十六人每天还要以半天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如以减半计算，为数更少；全社有八十三个生产小队，平均两个小队只分出劳动力一人。根据利港农业中学学生座谈，他们在家整日劳动，平均每人每天得七分工，现在进入农业中学，半天劳动，平均每人每天可得五分工，只差两分工。因此，从劳动生产率

来看，该校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实际所占的劳动力，就为数更少了。我们相信，让他们继续学习下去，对今天的农业生产并无多大影响。因此，农业中学现在在校的超龄学生，自愿回家生产的，可以转为业余学习；如果学生坚持学习而所需生活费用又能通过劳动收入全部自给的，可以让他们继续学习。我们必须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考虑，把生产物质财富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统一起来考虑，这样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矛盾。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江苏省委書記处書記)



# 毛澤东同志著作中的比喻



唐启运

毛澤东同志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紙老虎，确是十分鮮明的比喻。这个比喻使人們形象地認識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那种虛弱无能、外強中干的本質特征，使人們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中，許許多多的比喻都是十分鮮明的。他曾經把日本侵略者比作妖精，比作驢子，比作野牛，比作瞎子和聋子。把帝国主义比作怪物，比作大山。如：

“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三，884頁）<sup>①</sup>

“使宅（引者按：指日本侵略者）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陣，我們一声喚也要把他吓一大跳，……”（二，501頁）

“我們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們变成瞎子和聋子，……”（二，482頁）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一，156頁）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

封建主义。”（三，1102頁）

曾經把美帝国主义比作野兽，把各国反动派比作渣滓，比作蠢人。如：

“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象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及其他地方乱窜，集合了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

曾經把那些当帝国主义走狗、站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爭权夺利的大小反动派軍閥比作大狗、小狗、飽狗、餓狗，把頑固分子比作狗屎堆，把反动派比作粪坑。如：

“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引者按：指国民党內部之間的斗争）之間的一点特別有趣的爭斗，……”（一，143頁）

<sup>①</sup> “三”是“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下同。凡不是选集中的例句，另在句后注明。引文内着重者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三，1116页）

“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二，731页）

从上面这些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野蛮、愚蠢、肮脏、卑鄙的东西，他们就是腐臭面和阴暗面的代表。他们的本质注定了他们是见不得光明的，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曙光所照亮的世界里将最后失去其立足点而死亡。

在另一方面，另一个极端，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比喻中却看到了光明世界的代表，他们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人的人民群众，是烧毁腐臭面和阴暗面的人民军队，是引导人民前进的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一，134页）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三，1102页）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盆，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一，67页）

“它（引者按：指中国革命高潮）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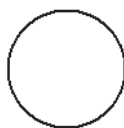
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一，110页）

“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二，462页）

从这些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和他的军队，和他所热烈拥护的社会主义，和他所衷心爱戴的共产党是多么的坚强有力，他们是铜墙铁壁，是上帝，是如来佛的手掌。他们又是多么的美丽可爱，他们是光芒四射的旭日，他们是光明美好的象征。

从上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比喻中，我们可以晓得，比喻并非是单纯的語言技巧问题。当然，不懂得語言技巧是不能写出好的比喻的，然而这不是毛泽东同志善于比喻的根本原因。我们在这两种比喻中，觉得它之所以能使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鼓舞力量，之所以能使人受到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首先就在于它鲜明的思想性，在于它饱和的感情，分明的阶级的爱憎，在于它精湛的论断和科学的预见。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首先在这里探讨了毛泽东同志比喻中的鲜明性。

其次，要谈的是毛泽东同志比喻中的形象性。比喻的特殊作用，本来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远处的东西近处化，把深奥的事理浅显化。较难理解或较难掌握的概念和事理通过比喻而显现于眼前，



使人产生实感，引起共鸣，叫人明白。但是作喻的事物，由于各人不同的选择，就会使各人的比喻具有不同的特色。毛泽东同志用来作喻的事物，是人人共知的，以及与这种人人共知的事物相适应的浅显通俗的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词语。这和某些人追求奇词僻语的比喻是完全不同的。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时常要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怎么个样子呢？如果从抽象的理论上来说，则非浩浩荡荡长篇大论不可，但是毛泽东同志只用了两个平凡的词就把它的特性具体地说清楚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一，206页）

非一条直线那样发展的战争形态，自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错综复杂到什么样子，毛泽东同志用“犬牙交错”一语就把它说穿了。在说到抗日战争时，他说：“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二，461页）

游击战争有不同于正规战争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形下，游击部队迅速转移就是其特性之一，但是迅速到什么程度呢，在毛泽东同志的笔下，就把这个程度一语道破了。他说：“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二，405页）

解放以来，人人都谈批评的意义，无不举医生治病一语来作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毛泽东同志最先用的。这确实是比喻得浅显明白，真是三尺孩童也能领会。毛泽

东同志说：“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三，829页）

把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和没有放下的精神负担喻为包袱，这是人人都知道了的，但是却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比喻。毛泽东同志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三，951页）

把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比作灰尘，也是毛泽东同志首创的比喻。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三，1097页）

东风压倒西风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所用的。东风是清新的风，使人和气象蓬勃的感觉联系起来，而西风是凄冷的风，只能使人感觉到寒意。

望远镜和显微镜、犬牙交错、流水和疾风、医生治病、包袱、灰尘、东风和西风，这些都是人人共知的平凡事物。毛泽东同志就是把它用来使许多抽象的概念



或事理形象化了。

拿流传广泛的谚语、成语、典故来做比喻，是毛泽东同志比喻的形象性的另外一个特点。

“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三，863页）“锦上添花”是喻提高，“雪中送炭”是喻普及。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三，866页）“阳春白雪”也是喻深入、提高，“下里巴人”也是喻通俗、普及。

“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二，585页）“笑里藏刀”是喻外和易而内阴险的伪善者，张伯伦及其伙伴就是这样的伪善者。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二，496页）

“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观了。”（二，773页）

“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二，848页，指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

这些谚语、成语、典故，是汉族人民许许多多的智慧花园里的一两朵花。正因为这是汉族人民所特有的，所以用来作成的比喻就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使人看了

特别感到亲切。

再次，我们要谈到的是毛泽东同志比喻中的多样性。

几个能喻者来说明一个被喻者，这是比喻的多样性的表现之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一，145页）同是长征，但用了三个能喻者来说明。“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一，280页）“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一，278—279页）“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一，301页）也都是用三个不同的能喻来说明同一的被喻者，用碰壁、跌交子和碰钉子来喻犯错误。

此外，毛泽东同志所比喻的词语，或者是口语，或者是谚语，或者是成语，或者是典故，这也是他比喻中多样性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同志的每一个比喻都是经过认真的推敲和着力的锤炼的，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十分恰当和十分准确的，并不是现象的堆砌，随便作喻，而是对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间的某方面的共同点作了高度的概括，以及与这概括性相适应的是那唯一能准确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词语。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比作箭，把中国革命比作靶。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三, 821 頁) 就是說, 馬克思主義的箭不能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靶而亂放, 要有的放矢, 理論要和實際相結合。一個不是那麼容易懂得的理論, 由於毛澤東同志用了準確的比喻, 也就立刻懂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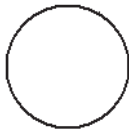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一, 127 頁), “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齋粉”(二, 684 頁), “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一, 150 頁), “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1957 年 11 月在蘇聯的發言), “中國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 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1958 年 9 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這許多都是準確地選用了最恰當最凝煉的詞語來作比喻的; 句子的形式又是那末的直截了當, 干脆利落, 簡明精煉, 確是準確性和精煉性的巧妙結合。

通過同一事物否定式的比喻和肯定式的比喻這兩方面的對照, 更明顯地看出了毛澤東同志用語的準確性和精煉性。他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做文章, 不是繪畫綉花。”(一, 18 頁) 革命是“暴風驟雨, 迅猛異常”(一, 13 頁); “這些作風不正, 并

不象冬天刮的北風那樣, 滿天都是。”(三, 814 頁) “這不過是一股逆風, 一股歪風, 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三, 814 頁) “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 大築其烏龜殼, 以為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一, 134 頁) 等等。這都是對同一件事物的兩種比喻, 兩種比喻代表兩種不同的看法, 從兩種不同的看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選用比喻所應有的思想性和正確的立場觀點。毛澤東同志的比喻所以那麼準確和精煉, 所以那麼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這和他高度的思想性和鮮明的立場觀點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總而言之, 毛澤東同志的比喻是鮮明的、形象的、多樣的、準確的、精煉的。毛澤東同志不但是偉大的人民領袖和思想家, 而且是傑出的語言大師和修辭家。不少同志都說不用看作者的名字, 看了文章也知道是毛澤東同志寫的。毛澤東同志的語言是有他獨特的風格的, 而獨特的風格所由表現的方法之一, 就是他那鮮明的、形象的、多樣的、準確的和精煉的比喻。

(轉載自“中國語文”一九五九年四月號, 轉載時, 略有刪改)



# “醒々吧，美国！”

——从美国失业工人大会看到的

楊重光

业斗争中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当今年美国生产指数已有回升而汽车工人的失业问题仍然不能解决的时候，受害最深的底特律汽车工人就曾经要求向华盛顿进

四月初，华盛顿已经是春天了。成千上万的旅行者拥塞在街头的人行道上、林荫道上和公园里。每年四月的第二个星期，这里的人们都过“樱花周”，观赏日本的樱花。但是在今年这个传统的节日里，华盛顿却充满着不宁静的气氛。好几张当地报纸都写着：让今年的樱花周称为“美国的失业周”吧！因为四月八日，美国失业工人大会在这里召开。从美国十五个严重失业地区来的上万个失业工人代表，他们内心充满着忧愁和焦虑，哪有闲情逸致来看花呢！

他们带着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的希望、不满、抗议和各种委托来到华盛顿。很多失业工人为了让他们的代表能来开会，让美国的政府大员们听听他们的呼声，曾用尽办法募集旅费。他们代表着多少美国失业工人的情绪和要求啊！

这次大会的召开并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汽车工人早有召开这样会议的要求。在一九五七年开始的这次美国经济危机中，汽车工人受到的损害很严重，他们在反失

行抗议性的请愿，并要求“劳联—产联”尽快召开失业工人大会切实解决美国工人的失业问题。失业工人的激昂情绪，使上层工会领袖不能不加以考虑。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华尔特·路德，在密执安州兰星举行的“劳联—产联”立法会议上就许过愿，他说准备率领失业工人大规模地列队到华盛顿请愿。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也发出了一个行动计划，提出了请愿和召开就业会议的要求。这个正当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劳联—产联”以主席米尼为首的上层领袖的完全支持。不久前在圣儒昂召开的“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上，米尼等害怕失业工人群众性斗争的开展，否决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提出的失业工人到华盛顿集体请愿的要求。但是他们又怕完全无视失业工人的要求会使自己在群众中孤立，于是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召开这次大会。

根据美国“劳联—产联”的决定，大会只限美国东部和西部十五个严重失业地区五千名失业工人代表参加，但是结果却来了将近一万人。这次失业工人大会是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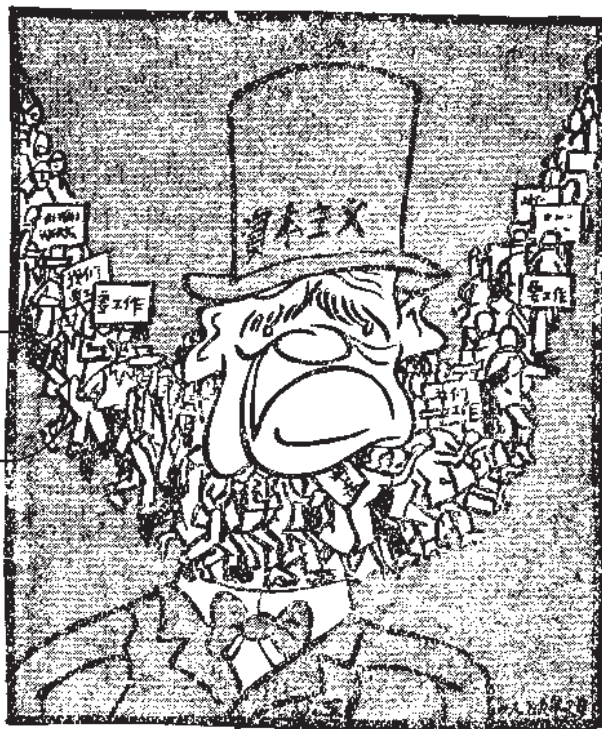


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那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美国工人反失业的大会。在大会开幕那天，天刚亮，华盛顿的街头上出现了很多穿着工作服，头戴白色纸帽的失业工人，纸帽上写着：“我们要工作”。早上十点钟，在华盛顿市郊的一座大楼——国民卫队军械局大厦的入口处，不少失业工人举着标语牌守候在门口。标语牌上写着：“醒醒吧，美国！”，“让所有人都有工作”，“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充分就业——美国人最大的愿望”，“美国有二百六十七个严重失业地区”。

美国失业工人这种焦急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美国官方用尽各种美丽的词藻也掩饰不了美国失业问题的严重。在美国的重重新闻封锁下，也不能不漏出一些失业的真相：底特律每七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失业，匹茨堡每八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失业，个别特别严重的地区失业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六。三月三十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当你在宾夕法尼亚州旅行的时候，你到处都会发现由于矿山的关闭或伐木地区的萧条而造成的死气沉沉的‘鬼域’。”

当人们看到最近美国报刊所刊登的关于这个大会的消息

时，脑海里就会涌现出一幕幕美国失业的景象：失业救济所门前蜿蜒的长蛇阵，躺在路旁打瞌睡的失业小伙子，华盛顿的小巷里那些穿着有窟窿的皮鞋疲乏地徘徊着的人们……。在这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中，有出了学校在军队中服了三年军役的大学毕业生，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对于劳动力市场过剩的垄断资本家来说已经是“太老”了；有失业的电气工人，他害怕自动化已经永远排除了他被复雇的机会；有失业的假钻石镶嵌工人，她该领的救济金都已经领完了。……。尽管最近美国不少的工厂的烟囱里重新又喷出了浓烟，失业的数字



也是一条绞索

华君武作



却没有很大降低。上个月美国工业公司董事长斯奈德就说过：“我认为全国生产率和生产量将增加，但是整个劳动力不需要大大的增加。……目前工业的趋势是向着改进和提高生产设备的效力和能力的方向发展，的确，为了生存起见也不得不如此。对于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依赖是越来越少了。”这几句话就是垄断资本家对当前美国失业问题的描绘。看来，随着自动化趋势的越加发展，美国的失业问题也将越加严重。

这个会议并不是进步的人士所召集的。在参加会议的人群里，除了失业工人外，还有工会领袖、政治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其中不少人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维护人参加的。美国劳工部长米契尔也出席了大会。尽管如此，这次会议却反映了美国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广大阶层对失业的巨大恐慌。

看看“劳联—产联”主席米尼在开会词中说什么吧。他说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集中全国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第一号问题就是群众性的失业”。他承认美国的失业是“人间的悲剧”，“群众性的失业对我们的国民经济来说，成为日益增长的威胁。失业不仅对失掉工作的工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对工业和农业也是这样。”米尼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一名忠实的卫士，但是迫于失业工人群众高涨的情绪，在这次发言中，他也不能不尖锐地指责了美国国会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他指出，不久前国会通过把发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延长三个月，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无济于事”的。米

尼认为政府有关方面对就业问题的乐观表现，不过是“夸大的宣传”。美国官方发布的三月份失业人数四百三十六万二千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去年以外三月份的最高数字。他说，工业生产已经回升到危机前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工业中的就业只回复到百分之四十。

华尔特·路德代表汽车和航空工业工会发言，他用沉重的词句描写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作为一个人，没有人能和失业工人受到的煎熬相比，当他成天找工作而徒劳往返，当他把失业救济金用得精光，而当他必须回家，眼巴巴地瞧着自己饥饿的孩子们，想着他们将用什么话来问他的时候……。”他率直地承认，“经常的群众性失业——这是民族的灾难。”他不能隐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痼疾：“成百万工人没有工作，而我们生产潜力的重要部分却没有发挥出来。”“美国有二百六十七个失业严重的地区，失业超过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六，这里还不算那些只做部分工作和政府没有统计在内的人。”大批熟练工人都被垄断资本家抛掷在街头上，在某些汽车工厂中，二十年工龄以上的老工人都被解雇了。他引用了“华尔街日报”的材料说明美国工人由于实行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是更多的工人却因此被迫失了业。“华尔街日报”说：“劳动生产率成长着。新设备使更少的劳动力做更多的事。今天不到一千一百九十万工人所生产的产品比起一九四八年一千二百七十万工人的产品来，还多上百分之三十五。”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技术革命



和技术革新对工人的处境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断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劳动变成是愉快的事情，工人的生活更加幸福；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却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很多工人的饭碗，使更多工人成为失业的后备军。

美国铁路工人工会主席乔治·哈里逊在发言中也指出了当前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同工人失业数字增加成正比例的现象。他说，一九五九年初三个月，美国铁路的载货量比一九五八年同一时期多百分之六，但是铁路上的就业数字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有一百五十万铁路工人，到一九五〇年减少到一百二十五万，一九五六年只剩下一百万。而一九五六年铁路载货量却是战前的二倍。“铁路上的失业成为经常性的不治之症。成千上万熟练的和经验丰富的员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抛到街头上。最近十八个月，就业显著缩减，由于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已有许多工人失了业，因而问题就特别严重。”在失业工人受尽痛苦的同时，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却不断增加。哈里逊在发言中指出，尽管失业是这样严重，根据一九五八年最后四个月的情况，铁路的收入一年中将有纯利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大于战后大部分的年代，并且和收入最高的年份接近。

严重的失业引起了美国正直的政治活动家的不安。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保罗·陶格拉斯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在我们国家中有许多穷人，但是政府却千方百计地

力图用充气的玫瑰水写的指示来掩饰这个事实……”，“当我们的仓库把食品装得满满的时候，人民却在挨饿。这是多么野蛮啊！”他指出了这个令人注意的事实：“大批失业的存在对企业主们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可以使工资和物价保持低的水平。”

美国劳工部长米契尔也在会上发了言。他在发言中不能不承认：在今天的美国，要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会场上也不乏反劳工的言论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美妙”的歌颂。但是失业工人代表们都用“嘘……”“蒲……”之声来回敬这些“妙论”，米苏里州共和党议员卡尔底斯发言时就受到这样的“欢迎”。

这次会议在政府和工会右派领袖的控制下，并没有对积极解决失业问题采取切实的措施。他们主观上只是为了给失业工人以暂时的“欣慰”，从而力图限制美国工人群众反失业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力图麻痹他们的高涨的战斗精神，因而会上只通过了两个内容比较空洞的决议：要求美国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失业；要求美国总统召开工人、农民、企业界人士和政府代表的会议，来讨论如何解决失业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美国广大的失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痛苦和悲惨的处境；美国工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对垄断资本家把危机转嫁给工人的罪恶行为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和控诉。资产阶级政客、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战后时期大事宣扬关于“人民资本主义”和阶级合作的谎言，在事实面前不能被彻底击破了。

